

礦山的祭典—金瓜石山神祭的歷史研究

Rituals performed at mines —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in Jinguashi

駱淑蓉¹ Shu-Jung Lo

摘要

本文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紹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宗教政策，並針對政策當中與神社議題有關的部分做討論。第二部分則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中的歷史記載，分析金瓜石山神祭的特色，並在前述宗教政策的背景下，觀察山神祭的微妙改變。此外，並透過與瑞芳礦山的對照比較，以及日本日立礦山山神祭的案例介紹，進一步解析山神祭在昔日礦山聚落中，代表礦山娛樂生活的特殊定位。

關鍵字：金瓜石神社、山神祭、總督府宗教政策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s religious polic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discusses about matters pertinent to the Deities of the Mountain Shrin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Ogon Shrine or Gold Temple) in the policies.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in Jinguashi, observes the delicate changes on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ligious policies. By comparing Jinguashi Mine with Ruifang Mine, as well as by presenting the case of ritual of mountain deities of Hitachi Mine in Japan, this paper further explicates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ritual of mountain deities in the entertainment life of the mining communities.

Keywords: the deities of the mountain shrine in Jinguashi, rituals of mountain deities, religious policies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¹ Email: lu.shujung@gmail.com

壹、前言

提到臺灣現存的日本神社，多讓人聯想到日本統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是日本統治末期，日本官方企圖以廣建神社，讓臺灣人民藉由習慣祭拜神宮大麻²，達到信仰改造、效忠天皇目的的一種手段。然而日治前期(1895-1919)臺灣興建的神社，有部分其實相當於早期臺灣移民建置的廟宇，是由民間的日人基於出生、結婚、信仰、節慶等生命禮俗，以及祭典活動的需求下，籌措興建³。這些民間興建的神社規模小、社格低，祭祀日本移民從家鄉分靈而來的神祇，與皇民化運動期間由官方主導下所興建的神社大為不同。

神道信仰在日治時期，屬於在臺日人的主要信仰，日治後期官方雖然強力推動神道國教化、皇民化運動，但神道信仰始終未能成功落實在臺灣民眾的信仰生活當中。隨著戰爭結束日人撤離，神道信仰在臺灣也隨之消失。日治時期每一年圍繞著神社所舉行的各項大小祭典、節慶，也因後繼無人，昔日的影像只殘留在少數的老照片當中，不復記憶。臺灣光復後，各地遺留下來的日本神社多數被改建為忠烈祠，部分神社用地也被作為學校、公園、飯店、廟宇或其他用途使用，另有少數神社被指定為縣/市定古蹟。光復後出生的世代，若非長輩口述，一般人對於這些遺留下來的神社遺構十分陌生。

有關日治時期神社議題的討論，除了神社建築研究、神社空間特性研究之外，與本文探討內容相關的先行研究，主要有2012年黃金博物館委託，林承緯主持下所做的《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規劃研究案》(未出版)，除此之外，尚可分為宗教政策及地方社會融合兩個面向。蔡錦堂的《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針對日治時期不同階段，日本官方的臺灣宗教政策、對於臺灣既有宗教的態

度、皇民化的背景與成敗，以專書做了十分精闢的分析說明。陳鸞鳳在《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中，除了指出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之外，對於臺灣各地神社興建的相關法令與神社數量的分布亦做了具體的介紹。陳凱雯的〈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則分析在殖民統治下，地方代表性的廟宇祭典受到神社祭典影響的過程。

黃金博物館2012年在林承緯指導的團隊協助下，嘗試恢復過去山神祭中「扛神轎」的祭典片段，並規劃一場別開生面的「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獲得參與民眾一致好評。本文在思考這項活動的意義時，深覺必須對於日治時期的宗教政策與神社興建、金瓜石山神祭在過去礦山生活中的定位，等等議題有通盤性的理解，才能將重現這項無形文化資產的意義正確地傳達給參與活動的民眾。因此，本文在前述研究者的研究基礎下，將依序介紹在總督府宗教政策下，金瓜石神社的興建背景，並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相關礦山的案例比較，分析整理金瓜石山神祭樣貌的改變，以及這項祭典在礦業生活中的定位。

貳、日治時期的宗教政策與神社興建

臺灣總督府對於殖民地臺灣的宗教政策，並非一開始即積極的推動。根據蔡錦堂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1994:10-12)中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臺灣的宗教政策可區分為三個階段。明治28(1895)年日本領臺至大正3(1914)年為第一階段，採取放任、溫存的態度。大正4(1915)年西來庵事件⁴發生至昭和5(1930)年為第二階段，總督府開始進行臺灣的宗教調查，同時著手進行宗教事務的整頓。昭和6(1931)年至戰爭結束則為第三階段，也就是強調國家神道信仰，興建

² 「神宮大麻」指的是由日本伊勢神宮所頒布的神札。昭和12年(1937年)，臺灣神職會發佈「正廳改善實施要項」，勸導民眾將家庭廳堂中央安置的祖先牌位更換為「神宮大麻」，希望改變臺灣人的信仰。吳密察監修、遠流臺灣館編著，2000。《臺灣史小事典》，152。

³ 例如：花蓮港廳的吉野(1912)、豐田(1915)、林田(1915)三間神社，皆是建於日人移民村內的無格社，臺北稻荷神社(1911)則為臺北城內日人聚落中的鄉社。蔡錦堂(1994)，《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20，351(附錄三)。

⁴ 「西來庵事件」為日本領臺後由臺灣漢人發動的最後一場，也是最大的一場武裝抗日抗爭事件。

神社、祭拜神宮大麻的展開時期。本文將依上述三階段，簡要介紹日治時期臺灣的神社興建背景，以及總督府重要的宗教政策及作為(表1)。

第一階段(1895-1914)，明治28(1895)年日本領臺至大正3(1914)年期間，也是一般歷史學者認定的「特殊統治主義時期」⁵。這個時期由於臺灣漢人、原住民的抗日行動頻仍，日本政府派駐臺灣的數位武官總督，多採緩撫並進政策，力求治安穩定。明治29(1896)年，日本首位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發出「有關本島既有社寺保護的諭告」⁶，內容指示：「...於軍務倥傯之際，對於供給軍用的本島既有的廟宮寺院，基於治民保安的考量，不得損傷其舊觀，尤其不允許破壞神像、搗亂神器。今後應注意保存其舊態，提供軍用後應儘速恢復其舊態...」，此諭告發布後，減少許多領台初期，日人官吏士兵佔用廟宇、破壞神像的情形。

如果不包括各地零星、小規模由日人興建的「無願神社」⁷，這個時期隸屬總督府管理的公認神社，只有14座(蔡錦堂，1994:19-20)。其中除了縣社開山神社及官幣大社臺灣神社之外，其他多為在臺的民間日人集資興建、維護的無格社⁸。神社的興建完全因為日人信仰上的需要，地點多位於日人集中的生活區域或移民村內。這個時期的日本官方為避免引起臺人反彈，雖然明文規定社寺廟宇的興建內容、調查既有廟宇的財產持有情形，但並未否定既有寺廟齋堂等的存在，也看不出有向臺灣人民積極傳教的態度(蔡錦堂，1994:19-20)。

大正4(1915)年「西來庵事件」發生後，總

督府開始針對臺灣的既有宗教進行調查，進入宗教政策的第二階段。此一階段與一般學界認定的「內地延長主義」(1920-1937)⁹時期大致重疊。大正8(1919)年，總督府出版《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該書對於臺灣宗教的態度，認為只要沒有妨礙國家利益且造成治安問題，就算是迷信也不加以干涉，同時在大正8年成立的社寺課，則開始規劃如何教導臺灣民眾正確的信仰觀念。大正10(1921)年起，社寺課陸續指導援助臺灣民眾信仰團體進行宗教教育。但因指導教育執行並未普及化，臺灣民眾固有信仰生活依舊。蔡錦堂認為這也是造成後來皇民化運動無法徹底的原因之一。

大正11(1922)年至大正13(1924)年制定的法規，對於縣社以下神社以及社、遙拜所的興建提出具體規定。包括設立時應具備的設施、信眾的人數、神社費用的提出、後續的維護方式，以及未來若有合併或廢止情形時皆有具體規範。然而在這個階段，仍不見臺灣人興建神社。而在臺日人雖有年節參拜上的需求，但因為法規規定的神社規模，在興建與維持費用上所費不貲，神社未見明顯增加。反而是社格較低的「社」¹⁰或「無格社」開始增建，增加地區偏重在總督府正積極開發的臺灣東部，尤以原住民族為主的「番」地臺東廳最多(陳鸞鳳，2007:114)。

昭和6(1931)年，日本與中國之間爆發918事變，政局的變化也牽動宗教政策，進入第三階段。昭和9(1934)年，總督府頒布《臺灣社會教化要綱》，其中「教化設施」項第一條「神社崇敬」明確指出，「以神社作為地方教化中心。普及神宮大

5 「特殊統治主義時期」，指的是日治前期的殖民統治政策。是將殖民地視為異法域，制定與日本不同的制度來適應臺灣的特殊情況。「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詞條 (瀏覽日期:2013/07)

6 「本島在來ノ社寺保護ニ關スル諭告」(明治29年1月20日)，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7 「無願神社」指的是日人在新開拓的土地上，搭建形式極為簡陋的神社，祭祀從故鄉帶來的神祇，並不受到官方的認定。

8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訂定的神社社格，分為神宮(地位高於所有神社)、官國幣社、諸社(府社、縣社、藩社、鄉社、村社)及無格社。無格社雖然明記在神社清單中，也承認其存在，但不具社格。日本神社的社格規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廢止。

9 「內地延長主義」，指的是日治中期的殖民統治，約在1920年開始在殖民地臺灣採行同化政策，實施與日本內地相同的制度，目的在於促成日本帝國的統合。<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瀏覽日期:2013/07)。

10 「社」不等同於神社，除了社格較低、規模較小之外，泛指單純提供公眾參拜所需，奉祀神祇之處。又「社」與原住民的「社」容易產生混淆，故於原住民的蕃地使用「祠」字。「神社及社ノ取扱ニ關スル件」(大正13年4月28日)第11條，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麻奉齋。」。同年頒布的「有關神社建設要項」，則規定「各街庄皆須設立神社。一街庄一神社，禁止濫設。」昭和13(1938)年，總督府「有關社的整理事宜」，進一步針對社格較低的社提出規範，社的地點若建有神社，則必須將社廢止。

昭和12(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為了戰爭動員需要，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其中皇民化的手段之一即是宗教信仰的改造，積極將神道信仰推行全臺，希望讓臺灣島民真正成為皇民，為日本效忠。在這個階段的「神社」，被利用作為推廣侵略思想與軍國主義的教化場所。1936年至1940年之間，神社建造數量快速增加，約有30座(陳鸞鳳，2007:109, 116)。

綜觀日治時期(1895-1945)全臺各地興建的大小「神社」及「社祠」，日本官方認定的神社共有68座，若包括其他非官方認定的社祠在內，則

總數約有200座。但就當時行政區域劃分來看，大約只達到「一街庄一神社」目標的1/3而已(陳鸞鳳，2007:113-114, 120)。蔡錦堂指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的國家神道以及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在光復後徹底從臺灣消失的原因，除了因為光復後的國民政府為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事物，拆除、改建所有的神社，使得神道思想難以延續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臺灣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當中，日本的國家神道及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實並未成功的根植於臺灣人民心中，以及落實在信仰生活上。

以下，進一步列舉金瓜石社、瑞芳社、基隆神社以及瑞芳神社的歷史沿革，以便更清楚理解前述不同宗教政策階段下所興建的神社之異同。

表2的「金瓜石社」及「瑞芳社」，從興建時期、祭神與興建目的，可以得知屬於前述宗教政策

【表1】日治時期宗教政策階段及重要規定

日治時期	宗教政策階段	總督府重要宗教規定及作為	備註
特殊統治主義時期(1895-1919)	第一階段(1895-191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明治29(1896)年，「本島在來ノ社寺保護ニ關スル諭告」 明治32(1899)年，「寺教務所說教所建立廢合規則」 明治32(1899)年，「舊慣ニ依ル社寺廟宇等建立廢合手續」 明治38(1901)年，「(神社)寺院又ハ本島ノ旧慣ニ依ル寺廟等ノ所屬財產処分ニ關スル件」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20-1937)	第二階段(1915-193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大正4(1915)年~大正7(1918)年，臺灣宗教調查結束 大正8(1919)年，出版《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大正8(1919)年，總督府成立「社寺課」 大正12(1923)年，「県社以下神社ノ創立、移転、廃止、合併等ニ關スル規則」 大正12(1923)年，「社遙拜所ニ關スル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大正4(1915)年「西來庵事件」
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	第三階段(1930-194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昭和9(1934)年，頒布《臺灣社會教化要綱》 昭和9(1934)年，「神社建設要項ニ關スル件」 昭和10(1935)年，「神社創建ニ關スル件」 昭和13(1938)年，「社ノ整理ニ關スル件」 昭和14(1939)年，第17任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項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昭和6(1931)年，918事變 昭和6(1931)年，總督府開始推動「部落振興運動」、「社會教化運動」 昭和12(1937)年，七七事變 昭和16(1941)年，04.01「皇民奉公會」成立，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 昭和16(1941)年，10.27總督府召開「臨時經濟審議會」，決定改變「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現狀，朝向「農業南洋工業台灣」目標邁進

資料來源：《台湾における神社及宗教》(1940)、《台灣史小事典》(2000)、《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

第一階段時期所興建的神社。亦即當時的日本礦業經營者，有鑑於初抵臺灣，考量到礦山治安欠佳，以及遠赴臺灣的日人在信仰上的需求，特地興建神社。但因其規模未達到官方認定的標準，故只列格為「社」。神社的營建、維護、祭典開銷等等費用，皆由礦業公司自行籌措。

「瑞芳神社」則明顯為「一街庄一神社」規範下所興建，神社的創建緣於為了振興瑞芳庄民崇敬神祇的民風，作為國民道德的基本涵養。祭神亦從臺灣神社分靈而來。但因只列為無格社，所有營建經費亦由地方街庄行政單位自行籌措。

比較特別的是「基隆神社」，最初的社名為「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由當時居住基隆的有力日籍人士，基於日人婚喪喜慶的需求，自行籌措經費興建，祭神由日本香川縣具有航海守護神性質的金刀比羅神社分靈而來。大正 3(1914) 年，由神社信徒代表向總督府申請改名為「基隆神社」，並奉迎臺灣神社分靈。根據陳凱雯的研究指出：「改名為基隆神社後，從此募款對象從日人擴及至全基隆民眾，而原本只屬於日人信仰的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名義上轉變為全基隆市街民的基隆神社」(陳凱雯，

2010:85)。基隆神社的改名以及後來的昇格過程，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增加神社的募款來源，解決長期以來神社經費不足的困擾。但因為加祀臺灣神社分靈及天照大神，無形中增加不少國家神道的色彩。另一方面，總督府雖然認同基隆日人的需求，但在「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之前，還是要求民間要自籌經費，並未展現積極協助昇格的態度。從這一點也可以呼應前述總督府在治臺初期，宗教政策並不積極的事實。



【圖 1】神社舉行的婚禮 [山口洋子 (1942 年出生於水滄洞) 提供。照片中新郎 (木村要) 及新娘 (木村マツ子) 為其雙親。拍攝地點為臺灣的神社，作者推測疑似當時的基隆神社。拍攝年代不詳，推測應為 1930 年代末期或 1940 年代初期]

【表 2】金瓜石社、瑞芳社、基隆神社以及瑞芳神社比較表

神社名稱	金瓜石社	瑞芳社	基隆神社	瑞芳神社
鎮座時間	明治 31(1898) 年 3 月 2 日	明治 39(1906) 年 5 月 28 日	明治 45(1912) 年 3 月 9 日	昭和 11(1936) 年 7 月 10 日
地點	臺北州基隆郡瑞芳庄九分	臺北州基隆郡瑞芳庄煥子寮一六三番地	臺北州基隆市義重町	臺北州基隆郡瑞芳庄龍潭堵一〇二之七
社格	社	社	縣社	無格社
祭神	大國主命 金山彥命 猿田彥命	金山彥命 金山姬命	崇德天皇 大物主命 天照大神 能久親王 開拓三神 ¹¹	天照大神 能久親王 開拓三神
例祭日	6 月 28 日	5 月 28 日	6 月 3 日	7 月 10 日
備註	明治 30 年有鑑於金瓜石鑛山事業開始之時，土匪出沒頻繁，從業人員人心不安，為了安定人心，特建立神社。於金瓜石本山東端之地興建神廟，祭祀大國主命。	藤田組於瑞芳金山事業開始之時，因日本從業人員多數住在礦山，便仿效日本礦山，為了從業人員信仰及心靈上的需求，明治 39 年 5 月營造社殿，舉行鎮座祭，祭祀金山彥命及金山姬命。	明治 45 年，基隆的日本人澤井市藏從日本讚岐地方的金刀比羅神社奉戴其分靈，奉祀於基隆神社現址，鎮座時的社名稱為金刀比羅神社。大正 3 年 4 月，加祀天照大神、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稱基隆神社。昭和 11 年 3 月 25 日，列格為縣社。	祭神由臺灣神社分靈，神社的創建緣於為了振興瑞芳庄民崇敬神祇的民風，作為國民道德的基本涵養，於瑞芳庄龍潭堵瑞芳小學校後方興建瑞芳神社。

資料來源：《基隆神社誌》(1934)、《瑞芳庄要覽》(1935)、《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1940)

11 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

參、金瓜石山神祭的記載

金瓜石神社是民間自行籌建的「社」，雖然位處日治時期以出產金銅礦聞名的金瓜石礦山，有關金瓜石神社及其祭典介紹的相關史料並不多。本節擬從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分析在總督府的宗教政策改變過程中，金瓜石礦山的山神祭，是否也呈現不一樣的面貌。

日治時期的金瓜石神社，舉辦祭典的時間，除了每年例行的「山神祭」之外，若當年適逢天皇即位或是礦業公司易主經營時，也分別會在金瓜石神社舉辦「御大典奉祝」，或向神社進行簡單的「報

告祭」。若以金瓜石「山神祭」為主要內容，目前可檢索到共有 11 次不同年度的相關報導(表 3)。

從表 3 得知，金瓜石神社的「山神祭」，雖然並沒有每年出現相關報導，也不確定是否每年皆如期舉辦。但從縱跨金瓜石礦山三大經營時期來看，這項傳統至少延續了 36 年以上。而從內容描述亦可得知，日本人與臺灣人同日舉行山神祭及迎媽祖的傳統，至少也有 18 年的歷史。以下列舉礦山不同經營時期具代表性的報導內容，並逐一分析。

一、田中組及田中鑛山株式會社時期(1896-1925)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9 年 7 月 3 日日刊標題「金瓜石山神祭」報導云：

「金瓜石鑛山山神祭。依例於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時舉行。石神所長代理。仁井田基隆支廳長代理。其他瑞芳頂雙溪官民小學校生徒等參列。嚴肅奉式。續行玉串拜禮。小學校生徒奉奏唱歌。齊享神酒。式後有種種餘興。是日該地有媽祖祭典。臺灣人之餘興亦多。熱鬧非常云。」

金瓜石鑛山田中長兵衛經營時期(1896-1925)，共有 3 次有關山神祭的相關報導。上述 1919 年 7 月 3 日「是日該地有媽祖祭典。臺灣人之餘興亦多。」，為首次出現描述當地臺灣人亦於同日祭拜媽祖的記載。此時期山神祭舉辦日期為 6 月 15 日或 6 月 28 日，當日鑛山休業一天，鑛主會提供酒肴慰勞鑛工們。上午在神社舉行的祭典儀式，除了礦業公司經營者代表之外，瑞芳頂雙溪的地方官員、日人孩童就讀的小學校學童亦參加祭典儀式，儀式後則舉行餘興活動。從報載看來，日本人與當地臺灣人於同日，但是分別舉辦神社及拜媽祖的慶祝儀式，連餘興活動都分開舉行。

項次	報導年月日	刊別	報導標題	祭典日期	金瓜石鑛山經營者
1	1903.06.13	日刊	田中鉦山の山神祭	6.15	田中長兵衛 (田中組) 1896-1918
2	1907.06.26	日刊	金瓜石鉦山の鎮守祭	6.28	
3	1919.07.02	日刊	金瓜石山神祭	6.28	田中長兵衛 (田中鑛山株式會社) 1918-1925
	1919.07.03	日刊	金瓜石山神祭	6.28	
4	1926.06.27	夕刊	祭典延期	7.10	
5	1929.07.29	日刊	金瓜石山神祭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執行	7.29 7.30	後宮信太郎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 1925-1933
6	1932.07.27	夕刊	金瓜石鑛山山神祭典 ●●三●●●	7.29 7.30	
	1932.07.30	夕刊	金瓜石鑛山の山神祭	7.29	
	1932.07.31	夕刊	金瓜石山神祭誌盛 ●●三●媽祖	7.29	
7	1934.07.15	夕刊	金瓜石神社の祭十五、六兩日執行	7.15 7.16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 1933-1945
8	1935.07.17	日刊	金瓜石神社の祭典	7.15 7.16	
9	1936.07.15	日刊	金瓜石神社の例祭 けふから二日間	7.15 7.16	
10	1937.07.15	日刊	神社祭典	7.15 7.16	
11	1938.07.14	日刊	金瓜石山神祭十五、六兩日執行	7.15 7.16	

※ ● 表示原件該段無法辨識

二、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時期 (1925-1933)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29日日刊標題「金瓜石山神祭 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執行」報導云：

「台北州基隆郡瑞芳庄金瓜石鑛山山神祭は從來七月二十七日、八日兩日行はれる筈であつたが金瓜石鑛山会社の決算期に該当するため本年より二日間延期し臺灣人側の媽祖祭典と共に七月二十九、三十日の兩日を期して盛大に執行する事となつた本年は鑛山会社の好景なため会社では二日間に亘つて松旭齋天華一座を同鑛山に招き同鑛山員及び同家族の慰安をなす由であるが尚ほこの外山神祭余興として素人角力、臺灣人芝居、活動写真の映寫等あり山神祭当日は採鑛好景の余波を受けて非常な賑わいを呈するのであらう。」

金瓜石鑛山後宮信太郎經營時期(1925-1933)，山神祭的相關報導亦有3則，上述為首次出現舉辦日期改為兩天的記載（之前的報導舉辦日期皆為一天）。依據《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0）的記載，金瓜石神社每年例行性的「例祭」為6月28日，從1929年的這則報導看不出為什麼舉辦日期改至7月份。但可以看出，神社的祭典會因為公司營運狀況而延期、或因為礦況好轉而盛大舉辦等等，做出不同的變更。而從同日舉辦的媽祖慶祝也一併延期這點來看，報導中雖然並未記載地方居民是否反對延期亦或有任何不滿，但是可以合理推測，對於大多數居住在鑛山討生活的臺灣人來說，鑛山公司的營運和本身的利益息息相關，整個大鑛山聚落無形之間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當地臺灣人的經濟來源、生活穩定與否，皆受到鑛業公司的影響。廟宇的神明祭典雖然是當地臺灣人的信仰生活重心之一，但公司若基於某種正當理由，不得不變更祭典日期，對當地臺灣人來說或許是可以接受的。

而這個時期，日人的神社祭典和當地臺灣人的拜媽祖雖然各自舉行，但餘興活動似乎可以共同參與。

三、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時期 (1933-1945)

1933年金瓜石鑛山由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收購，設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在這個時期當中，金瓜石山神祭的相關記載約有5則，若加上新設社殿、與皇民化運動相關的報導，則共有8則。這個時期雖然循往例，山神祭時金瓜石地方居民亦同時舉辦媽祖祭典，但祭典日期又再次調整，改為每年的7月15、16日兩天。推測這應該與日鑛的發源地，日本日立鑛山的山神祭日期相同之故。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8日日刊「金瓜石鑛山で社殿を新設」報導云：

「台湾鑛業金瓜石鑛山には從來本山に形ばかりの社があつたが今回従業員の信仰の中心とし併せて唯一の遊園地ともすべく一万五千円の工費を以て社殿拝殿などを新築し觀賞木の植え付き、休憩所の設置などを行ふ事となつた、場所は大体本山付近になるべく、工事は二十日頃から着手すると」

1936年4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日刊標題「金瓜石鑛山建築社殿」報導了相同的內容：

「臺灣鑛業會社金瓜石鑛山今回欲在本山附近。建築社殿。拜殿。及整理附近為遊園地。栽種觀賞木。設休憩所等。經費按一萬五千圓。訂來二十日興工云。」

上述為1936年，臺灣鑛業株式會社為了讓金瓜石神社成為鑛山從業員的信仰中心，並作為鑛山唯一的遊園地，新建金瓜石神社社殿，並於其地附近設休憩所的報導。

從表3金瓜石山神祭的舉辦情形來看，金瓜石神社一直是鑛業公司，至少是日人員工的信仰中心，1936年擴建神社、新增休憩所，當然可能是1933年取得金瓜石鑛山經營權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單純為了擴建神社所為。但本文推測應該是為了要加強臺灣人從業員的信仰程度、增加臺灣人的造訪次數為主要目的。理由之一，由於金瓜石神社的地點位在本山山腰，地勢並不低，加上臨近本山四坑、五坑，附近運輸幹線密布，除了山神祭這種全鑛山休業兩天的活動之外，對於一般居民甚至鑛山從業人員來說，並非安全的遊樂地點。理由之二，金瓜石鑛山於1936年開始設有國語講習所、青年訓練團等設施¹²，皇民化運動前的部落振興運動¹³是否已逐漸影響至金瓜石鑛山聚落，是本文推測的理由，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

如前節所述，1934年總督府頒布「神社建設要項相關要件」，內容強調要讓神社成為教化中心，必須實施「一街庄一神社」。1936年7月10日，瑞芳庄興建的瑞芳神社舉行鎮座式。上述金瓜石鑛山建築社殿的報導後不久，《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7月15日日刊標題「金瓜石神社の例祭けふから二日間」報導金瓜石鑛山舉行例行的山神祭如下：

「基隆郡瑞芳庄金瓜石鑛山に鎮座する金瓜石山神社の例祭は十五、六日の二日間盛大に行ふ、当日は少年組の樽神興、大人相撲、柔剣道奉納試合などあり尚ほ同鑛山居住臺灣人側も同地勸濟堂に媽祖聖母を招請して同時に祭典を行い各部落十数か所に舞台を掛け台湾芝居の余興を行う事に依り内台人融合の一助ともなり相当に賑わう事と予想される」

報導中提到「…内台人融合の一助ともなり…（中譯：有助於內臺人民融合）」不知是否為報社有感於大環境的變動，自行加上的註解，因相關史料

不多，無法得知。

1937年7月爆發七七事變，隨著戰局的擴大，總督府對臺灣民眾「敬神尊皇」的要求更為強烈。1939年5月，臺灣總督府宣布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等三大政策，1940年4月2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標題「興建金瓜石俱樂部以慰從業員，七月祭典前開始營運」，報導「…今回多数臺灣人従業員の皇民化運動に拍車をかける為…従業員俱樂部（集会所）を建設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が…、大〇七月十五日山神社祭典に間に合う予定で急いでおる…（中譯：…為了加強多數臺灣人従業員の皇民化運動…興建従業員俱樂部…趕工中以便來得及於七月十五日山神社祭前完工…）」。

1941年4月，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由臺灣總督擔任總裁，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雖然前節提到昭和13(1938)年總督府「有關社的整理事宜」規定，「社的地點若建有神社，則必須將社廢止」。然而1940年仍有金瓜石神社的相關報導，金瓜石神社並未因為瑞芳庄的瑞芳神社興建而廢止。但自194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不見金瓜石山神祭的相關報導。

四、瑞芳社的山神祭

鄰近金瓜石的瑞芳鑛山（今九份地區）的山神社，如前節表2所述，是鑛主藤田傳三郎（藤田組）為了日本從業人員信仰及心靈上的需求，於1906年所建。從臺灣日日新報可以查詢到不同年度瑞芳社山神祭的報導，共有3則（表4）。1920年5月30日，《臺灣日日新報》標題「瑞芳山神祭」報導：

「瑞芳鑛山山神祭は例年の通り去二十七日午前九時より執行せられたるが重なる参列員は島内所長外同地官民並びに小公学校生徒にして式後小宴支那芝居

¹² 根據島田利吉在〈金瓜石鑛山の概況〉(1936年，《科學的臺灣》)所述，當時的金瓜石鑛山已出現「公立國語講習所」及「私設青年訓練所」。但1935年11月出版的《金瓜石鑛山概要》中，則尚未出現這兩項設施。

¹³ 「部落振興運動」是日治時期以部落組成的團體所推行的社會運動。1934年後大致通稱為振興會。其目的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在教育教化推廣方面，「敬神尊皇」與「普及國語」為實施重點。後者為提高日語普及率，要求各地設置國語講習所，讓學齡以上不諳日語者學習日語。「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瀏覽日期:2013/08)

の余興ありて盛んなりしと」

該項報導內容顯示例年皆有舉辦山神祭，當年參加者為礦業公司所長、地方官員、民眾、小學校學童等等，祭典儀式結束後並有小宴及中國戲劇表演等余興節目。

瑞芳礦山在 1918 年由臺灣人顏雲年買下，取得礦山經營權。1920 年 9 月創立臺陽鑛業株式會社（以下簡稱臺陽）。顏氏雖為臺灣人，瑞芳礦山的礦業從業人員也以臺籍人員居多，但在日本殖民環境下，礦業公司的所長仍由日人擔任。政商關係良好的顏氏，在成立新公司之後，依然依往例舉辦神社的祭典。1934 年 8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標題「瑞芳山神祭典」報導：

「基隆郡瑞芳庄九分鑛山山神祭祭典。訂來七日午前十時起●在社前設臨時祭壇舉行。本年度鑛業好況。屆期諒必熱鬧云。」

1934 年的祭典日期不知何故改為 8 月舉行。1933 年，日本政府宣布以市價收買黃金，鼓勵黃金增產。瑞芳礦山與金瓜石礦山景氣因此大為提昇，山神祭也透露出當年的盛況。

1936 年的山神祭，又恢復為 5 月 27 日辦理，並請到基隆神社的神職人員主持儀式。比較特別的是 1936 年 5 月 26 日《臺灣日日新報》標題「九分鑛山の山神祭」報導部分內容：

「…こうして兩祭神の●祭りは九分鑛山山神様の御祭と合同にすることとなりその第一回の御祭が二十六、七の兩日執行される全山一致●れるような賑わいを呈することであろう」

瑞芳礦山的西皮與福祿兩樂團，在 1936 年結束長期以來的不和，共組團體。並於當年開始舉行兩樂團不同祭神的聯合祭祀。這項祭祀活動與當年的山神祭結合，舉行第一次的三者聯合祀祭。當天晚上的餘興節目，臺陽以礦主身分招待承包採礦的 700 名從業人員到昇平座看戲，受到熱烈回響。從上述記載推測，瑞芳礦山的山神祭及相關活動，一直以來僅屬於日人之間的活動，1936 年是第一次與地方的信仰聯合祭祀，並開放給承包採礦的當地臺灣人一起參與。雖然是兩座相鄰的礦山，從山神祭的規劃，卻可看出兩者大異其趣之處。

項次	年月日	刊別	標題	祭典日期	礦山經營者
1	1920.05.30	日刊	瑞芳山神祭	5.27	顏雲年及雲泉商會
2	1934.08.06	日刊	瑞芳山神祭典	8.07	顏國年（臺陽鑛業株式會社）
3	1936.05.26	日刊	九分鑛山の山神祭	5.26 5.27	顏國年（臺陽鑛業株式會社）
4	1936.05.29	日刊	瑞芳鑛山山神祭	5.27	

五、金瓜石山神祭的特色

綜上所述，金瓜石的山神祭可歸納出幾項特色：

1. 日人從業員為主的祭祀活動。新聞記載的 1903 至 1938 年，剛好縱跨金瓜石礦山三大經營時期，推測這項傳統至少已有 36 年以上的歷史。
2. 山神祭的同日，當地臺灣人亦同時舉辦祭拜媽祖的相關活動，若根據 1919 至 1936 的報紙記載，這項歷史至少有 18 年左右的歷史。鄰近的瑞芳礦山山神祭，則以日人為主，自 1936 年起才有和地方信仰合祀的紀錄。
3. 山神祭的日期會因礦業公司臨時需求更改、延期，也會因為礦權易主而改變日期。拜媽祖活動的日期也同時更改或延期。

4. 礦業傳統、開運祈福。延續日人於礦山設山神社、祀拜山神的傳統。祈求“金苗多出”的同時，也祈求從業人員平安。
5. 犒賞員工、廟會娛樂。藉由山神社祭典的舉辦，礦業公司放假一至兩天，讓從業人員休息。礦業主另會提供酒肴、毛巾等犒賞員工。祭典結束後則規劃多項競賽、余興表演、活動，慰勞員工及其家人。



【圖 2】金瓜石山神祭（張英傑提供，推測應為 1930 年代後期）



【圖 3】金瓜石運動大會（張英傑提供，推測應為 1930 年代後期）

肆、日本日立礦山山神社祭典的樣貌

臺灣日日新報 1937 年 7 月 15 日有關金瓜石山神祭的報導中，提到祭典當日的余興活動有「常陸特有的盆踊」。“常陸”是日本的茨城縣，也是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簡稱日鑛）日立礦山的所在地。“盆踊”則是日人於 7 月 15 日「盂蘭盆節」時所跳的舞蹈。1933 年起，金瓜石礦山已為日所有，從這則報導可以推測金瓜石礦山由於易手日鑛，從日本茨城縣移居過來的技術人員、礦工們，在一年一度的山神祭後的餘興活動上，跳起茨城縣的傳統舞蹈，歡度祭典的景象。這也是唯一一則，山神祭祭典中透露礦山經營者家鄉背景的報導。

本文因為篇幅的限制下，根據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日立製鍊所的紀錄，僅介紹 1 則 1934 年 7 月 16 日日立礦山山神祭的報導如下（佐藤 孝，1982，日立製鍊所總務課，《日立鑛山山神社物語》）：

日立鑛山山神祭は、十五日午前八時合図の煙火と同時に、本山の山神社殿に鈴木所長を始め長沢採鑛係長その他各係員、消防隊等整列し、瀬谷社掌その他の神官によって、莊嚴なる祓いの式を挙げ、鈴木祭主より順次玉串を奉奠、神酒を酌みつつお山の安泰を祈願し、余興に移り、午前十時頃から本山地内を始め大雄院、万城内、桐木田遊園地等へ設けられた幾つもの掛け舞台上、芝居、大神樂、芸妓手踊、茶番、曲芸、浪花節、劍舞、花角力、管絃樂、松原音頭、高萩小唄など各種盛況の余興が展開され、觀衆は此処彼処へ雪崩込み、殊に夜間全山まばゆき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と相まって打ちあぐる呼び物の仕掛け花火、或は活動写真や、若い男女達が名物日立踊に人氣を呼び、近郷近在から潮の如くい集し、全く全山歓楽境と化し、日立、助川の鑛山街は終日ゴツタ返した。助川署は、殊に祭典二日間は管内駐在巡查の

外、松原、太田の両警察署の応援を求め、昼夜雑踏取締の任にあたらしめた

日立礦山山神祭每年皆於 7 月 15 日及 16 日舉辦，從上述記載，15 日上午 8 點至 10 點，由礦山所長、採礦部長官、員工、消防隊，以及山神社的神官舉行莊嚴的祭拜儀式、獻神酒。上午 10 點過後至次日全天，從早到晚則舉辦各式各樣的廟會活動，有傳統舞蹈、音樂表演，晚上整個山頭則點亮所有燈飾，並大放煙火，全礦山及附近村莊的居民，都融入歡樂的廟會氣氛樂不可支。為了預防脫序行為出現，礦山經營者還特別請求警察單位支援，取締失序情形。

日立礦山的山神祭，日期選在 7 月 15 日，據了解是為了配合日本的「盂蘭盆節」。每年的這個時候，出門在外的村民、學子都會返回家鄉掃墓、祭祖。山神祭安排在 7 月 15、16 兩天，讓礦山員工、員工家族得以利用共同的休假日，團聚一堂。除了處理家族祭祀之外，並齊向山神祭拜，祈求礦山平安、礦源不斷，同時放鬆心情享受一年一度難得的廟會活動。

日立礦山每年仍於山神社舉行例行性的新年祭、安全祈願祭、役員奉告祭、殉職者合同慰靈祭、大祭等等祭祀活動。但因礦山經營形態轉變，已轉型為公司內部員工的祭拜活動，過去整個礦山聚落同歡的情影已不復見。

昔日日立礦山的山神祭，就如同現在公司慰勞員工的康樂活動，這樣的核心意義，基本上與皇民化運動前所舉辦的金瓜石山神祭精神並無二致。

伍、結論

矢內原忠雄在其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序文開宗明義指出：「... 日本統治臺灣的各種政策，一向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要項目。不僅如此，日本對於臺灣的經濟要求，是決定統治臺灣各種政策的最有力因素。」日本統治臺灣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經濟上的需求。舉凡與經濟利益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課題，才是日本治臺初期最急迫想要掌握的。日本治台後十年之間(1896-1906)，著手進行了土地調查(1898年)、整備臺灣南北交通路線及基隆港築港工程(1899年)、臺灣舊慣調查(1901年)、戶口調查(1905年)、林野調查(1910年)等等。至於臺灣宗教狀況的調查，一直遲至 1918 年才完成初步的報告書。而從本文第二節所提到關於總督府的臺灣治理與宗教政策的不同階段，可以了解其實到了 1930 年代後期，因為中日戰局等大環境的刺激影響，才促使當時的總督府積極推展皇民化運動，並針對神社興建、神道信仰，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激進政策出現。

日治時期的金瓜石礦山與瑞芳礦山在經營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一直都是由日人經營，而後者則在 1918 年以後由臺灣人顏雲年掌握實際的經營權。金瓜石山神祭的特色之一，除了第三節所述的幾項特徵之外，在於日人礦主並未禁止當地臺灣人的媽祖信仰。金瓜石礦山一直以來負責媽祖祭典的信仰中心勸濟堂，隨著聚落變遷經過幾次的遷徙之後，於 1935 年重建於現址。現在的廟內壁面仍可看到當時的礦主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取締役島田利吉氏，在 1936 年捐款的記錄。

依據勸濟堂鄭金木先生的說法，日治時期的勸濟堂，會在礦山公司舉行山神祭的同時，慶祝關公聖誕祭祀，同時進行迎媽祖遶境，其本質就像是眾神聚會，與現在的迎媽祖活動相似。光復後勸濟堂

的迎媽祖曾一度改為 4 月份舉行，之後才又改為現在的農曆 3 月 23 日舉辦。陳凱雯在〈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中指出，〈...。基隆神社設立後，基隆媽祖廟慶安宮的遶境路線即以參拜之名延伸至基隆神社前，甚至曾有幾年間基隆傳統廟宇被要求與基隆神社例祭同一天舉行遶境活動。... 這種半強迫的聯合遶境方式只維持了四年，最後因為各廟宇以此舉與傳統習俗不符，且影響商家買氣為由，劃下了句點〉(陳凱雯，2010:90)。

相較於日治時期基隆地區臺灣人與日人複雜的社會互動環境，金瓜石礦山的關係則單純得多。不論是神社的祭典亦或是廟宇的祭祀，祈求的都是礦山的前途順遂，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金瓜石的祭典也反映出礦山命運共同體的特色。勸濟堂的興建者是金瓜石的苦力頭人黃仁祥家族，日人礦主所需要大量的臺灣人勞工，其來源都要仰仗苦力頭人的配合提供。不論就經營面長期的安定考量，亦或尊重信仰的角度，金瓜石的山神祭就這樣與當地臺灣人的迎媽祖同時舉辦了至少 18 年，形成一項難得的傳統。

昭和 11(1936)年，日立礦山山神祭的記載中提到，每年祭典正式開始的訊號，是當終年運轉的製煉所，馬達聲嘎然中止、大煙囪停止冒煙的那一刻，全山礦工、村民在歡聲中放下手上的工作，開始一年難得的飲酒、狂歡時刻。金瓜石神社與日治時期臺灣大多數的神社一樣，為日本礦山移民的信仰移植，山神祭則是礦業生活中的祈福傳統。從山神祭的內容來看，其主要目的，就是一年一度慰勞員工的康樂活動，對終年不間斷運轉的礦山來說，山神祭也反映出礦山獨特的娛樂生活。

誌謝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委員提供寶貴的審查意見，讓本文修正後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 林承緯、黃士娟，2012。《金瓜石神社活化再利用規劃研究案結案報告書》，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委託研究報告，未出版。
- 陳凱雯，2010。〈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臺灣學研究》，(10):75-96。
- 陳凱雯，2005。〈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民俗曲藝》，(147):161-200。
- 蔡錦堂，1994。《日本帝國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
- 陳鸞鳳，2007。《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頁：93-120，台北：學富文化。
- 《瑞芳庄要覽》，1935。
- 《基隆神社誌》，1934。
- 《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1940。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 佐藤 孝，1982。《日立鉦山山神社物語》，日立製鍊所總務課，未出版。